

王树声因何被称为“大别山守护神”？



本版图片来自网络

1947年秋，我军转入了全国性战略进攻。大病未愈的王树声主动请战，要求重返大别山，任鄂豫军区司令员，指挥军区游击兵团，与兄弟部队并肩作战，成功实现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问鼎中原”和“定鼎中原”的战略目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树声就是“大别山守护神”。

“我是大别山的儿子，我要再打回大别山”

1947年8月上旬，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行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插国民党战略腹地，揭开我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看到刘邓大军投入到创建中原解放区的战斗，在医院养病的王树声决定提前出院，请求组织批准南下，参加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他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写道：“大别山是我的故乡，我是大别山的儿子，我要再打回大别山！”经过综合考虑，中共中央和中原局批准了王树声的请求。

1947年的中秋，王树声告别了妻子，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临行前，他向妻子赠诗一首：久别重逢今又别，不知人月几时圆？伤思艰险犹尝尽，誓将奋斗会中原。

随后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王树声一边组织力量创建和巩固根据地，一边率领所部配合主力，与敌周旋，同强大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激烈的角逐。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大别山的重点“围剿”，鄂豫解放区也随之建立并发展起来。

“坚持大别山就是胜利”

在国民党血腥镇压下，鄂豫区各级党组织和地方政权被迫转入地下，部队多被压缩在山区，昼夜与国民党周旋，部队极度疲劳，加之粮食短缺、武器破损、弹药无着，困难重重。面对这一严重的斗争局面，王树声根据中原局《关于开展大别山游击战争的指示》，明确指出“各级党委和部队要下定与大别山人民同生死共患难的决心，反对任何动摇右倾，部队要建设饱满的战斗意志，打击弱敌，打击土顽，反对清剿，力求打胜仗，是创造大别山根据地的先决条件。”

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王树声决定改编部队，他强调指出：“坚持大别山就是胜利！”“只要我们能在大别山坚持住，把敌人大量正规军牵制住，使我刘邓大军在外线大量歼灭敌人，将来全国胜利后，毛主席在功劳簿上也会给我们记上一份成绩。”

在王树声的率领下，鄂豫军区部队以百折不挠的精神，经过3个月的艰苦奋战，歼灭国民党军及国民党地方武装4000余人，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站稳了脚跟，胜利地渡过了坚持大别山斗争中最为艰苦的时期。

“不剿灭土匪，我决不下战场！”

1949年6月，湖北军区迁至武昌。此时，鄂豫军区已撤销，王树声改任湖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

国民党军从大别山败退时，有计划留下了部分武装人员，妄图利用大别山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特殊复杂的地理环境，开辟所谓“第二战场”。大别山的匪患严重威胁着这一地区新生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给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为此，王树声主动请缨，要求到大别山指挥剿匪。

在军区的一次会议上，王树声站起来说：“我到大别山剿匪去，我要到那里去还账”。就这样，王树声毅然挑起了指挥大别山剿匪的重担。作为剿匪总指挥的王树声，密切关注各线战局的发展，及时调整部署，转变斗争方式，以营、连为单位，在内线控制要点，外线严密封锁，进行分片驻剿；同时展开强有力的政治攻势，发出布告，“凡各地股匪、散匪及其首领，不论过去如何，只要从今悔悟，改过自新，在火线上放下武器，或向政府登记悔过者，一律宽大处理，保证其身家性命之安全”。这一做法果然奏效，受尽饥饿和寒冷折磨的土匪，纷纷下山，缴枪投诚。

在激烈的剿匪斗争中，王树声累倒了，持续高烧不退。组织上曾经数次安排他回武汉治疗，但他坚持不下火线。妻子杨炬受军区领导委派，前来说服他暂时回武汉休养。王树声却坚决地说，“不剿灭土匪，我决不下战场！”结果，杨炬不但没有说服王树声，反而被留了下来。这样，王树声一边治病，一边指挥剿匪作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王树声受邀赴京参加开国大典。但是他毅然放弃了进京机会，誓死为人民剿灭土匪，还大别山一片净土。

经过半年剿匪作战，王树声指挥各线部队，终于剿灭了为害大别山的匪患，恢复了大别山地区的社会秩序，为实行土地改革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来源：北京日报

老舍回忆创作《四世同堂》： 不是写东西， 而是玩命

《四世同堂》是老舍自认为“写得最好的一本书”。回顾整个过程，他如此形容：“这简直不是写东西，而是玩命！”

抗战爆发后，老舍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随即西迁重庆。此时，夫人胡絮青和孩子到北平侍奉老舍年迈的母亲。1942年老人病故，胡絮青又用了一年时间，出生入死地带着孩子们返回老舍身边。

亲身经历国破家亡，胡絮青把所见和愤慨反复讲给老舍听。几个月后，老舍说：“你九死一生地从北京回来，给我带来了一部从来未写过的大部头。”这时，老舍正处于痛苦的煎熬中。

首先是艰难的生活环境。老舍虽名声在外，实际上却穷得很。胡絮青在编译馆找了个小差事，每月工资极低；老舍负责抗战宣传，几乎没有收入，只好给报刊写文章挣稿费。他常为是否放弃写作去工作而纠结，思前想后，“宁可受苦，也不愿改行”。同时他家的屋子很小，白天烈日暴晒，晚上群蚊围攻，老舍写作的房间因老鼠多被称为“多鼠斋”。

其次身体不是很好。贫血、疟疾、痢疾等病症一直折磨着他，乃至只要稍一劳累便头昏，如不马上停止写作，就会由昏而晕。

再次是杂事多。除了抗战宣传外，老舍要给许多报刊写文章，还有不少是朋友约稿。这些文章大多是硬挤出来的，所以写得并不理想。为了构思和创作《四世同堂》，老舍经过深思熟虑，在林语堂主编的《宇宙风》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磕头了》的文章：“抗战中，我写了许多不像样的东西。所以决心写一部相当大的长篇小说，以赎粗制滥造之罪。朋友们，别再索要小文！让我在病痛的煎熬中写完这个长篇吧！我向肯帮忙的朋友们磕头致谢！”

排除了上述干扰，老舍自1944年1月开始写作。1946年3月因到美国讲学，暂时停滞。1946年底，在朋友的鼓励下，他在美国继续写。到1948年6月底，终于完成了这部长达百万字的鸿篇巨制。

《四世同堂》是老舍自认为“写得最好的一本书”。回顾整个过程，他如此形容：“这简直不是写东西，而是玩命！”

来源：人民政协报

钱钟书：“没有书不能住”

1970年7月，钱钟书和杨绛夫妇被安排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改造思想。杨绛分在菜园，钱钟书先是负责烧开水，后安排去邮电所取邮件和报刊。

两人被分在一个窝棚里居住。杨绛笑着问钱钟书：“咱们住这个地方行吗？”钱钟书肯定地回答：“不行。”旁边的人说：“咱们干校就是这个条件。”钱钟书非常认真地想了一会说了三个字：“没有书。”对于钱钟书和杨绛夫妇来说什么物质享受全都舍得，没有书却不能过日子。

1972年，夫妇二人离开干校，回到北京。无处栖身，只好借住在办公室，这是一间危房，里面放了两张行军床、两个小桌子，一住就是3年。那时还是“文革”时期，在学术凋敝的险恶环境里，他们夫妇每晚都伏案笔耕。

随着改革开放，尤其是《围城》拍成电视连续剧后，钱钟书被大多数人所熟悉，他们的居住环境得以改善。当时，在钱钟书和杨绛夫妇的书房里，两张老式的单人沙发放在一角，用来招待宾客。房间里大部分位置都被书柜和书桌占据

着。一张写字桌靠东竖搁，另一张朝南横放。大的书桌是钱钟书的，小的书桌是杨绛的。朋友惊奇地问：“为什么书桌大小不一样？”杨绛说：自从《围城》拍成了电视剧，他的名气就大了，当然要用大的。”

俩人不仅才识渊博，而且记忆力极好。凡是浏览过的典籍，几乎都过目不忘。沉重的大部头辞典、百科全书，钱钟书竟然是按照字母顺序逐条细读的，对于常人来说深奥难读的理论著作，对钱钟书来说只是小意思。来源：老年生活报